



# 青铜觶起源探析\*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由于中原地区缺少类似觶形陶器的发现,铜觶的起源问题一直无人探讨。本文主要通过对山东史前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以及太湖地区夏商时期马桥文化陶觶的梳理,为铜觶溯源。认为铜觶直接起源于史前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觶,并在夏商时期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继续发展,直到最早铜觶在殷墟一期的出现。同时,以铜觶为主要例证,讨论陶器与铜器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铜觶;起源;大汶口文化陶觶;山东龙山文化陶觶;马桥文化陶觶;关系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ottery Zhi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of China, there is no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bronze Zhi. This paper mainly traces the origin of bronze Zhi through studying pottery Zhi of the prehistoric Dawenkou culture to Longshan culture of Shandong region, and Xia and Shang Period Maqiao culture of Tai Lake Region. This text thinks that bronze Zhi directly from pottery Zhi of the prehistoric Shandong Dawenkou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in the Xia and Shang period Maqiao culture, until the early bronze Zhi appeared in the first period of Yin ruins. Meanwhile,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ttery and bronze by the bronze Zhi that as the main example.

**Key words:** Bronze Zhi, the Origin, Dawenkou Culture Pottery Zhi, Shandong Longshan culture Pottery Zhi, Maqiao culture Pottery Zhi, the Relationship

青铜觶得名于北宋王黼的《博古图》,是商周时期的一类饮酒器,自殷墟一期出现后,发展迅速。殷墟四期开始进入酒器的核心组合,西周早期已取代觚的地位,与爵搭配构成酒器的基本组合,其在青铜器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于中原地区一直不见觶形陶器的发现,关于青铜觶的起源问题一直无人探讨。本文主要通过对山东史前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以及太湖地区夏商时期陶觶的梳理,为铜觶溯源,并借此讨论陶器与铜器的关系。

## 一、最早青铜觶的考古发现

关于最早的铜觶,李济先生曾在《记小屯出土青铜器》(上篇)中,认为小屯 M388 出土的一件器物,为觶形铜器。并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器身上加一提梁的为“卣”形,没有提梁的为觶形。小屯 M388 为殷墟一期墓葬,如果该器为觶,那么就是殷墟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青铜觶。但是,通过分析器形发现,该器高 19 厘米,圈足高 1.5 厘米,深 12.8 厘米,口径 5.9~6.1 厘米,颈径 4.3 厘米。细长颈,鼓腹垂于器身最下部,形制与觶相异,此器定为壶较为合适,岳洪彬先生在《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也将此器归入 A 型圆壶。而在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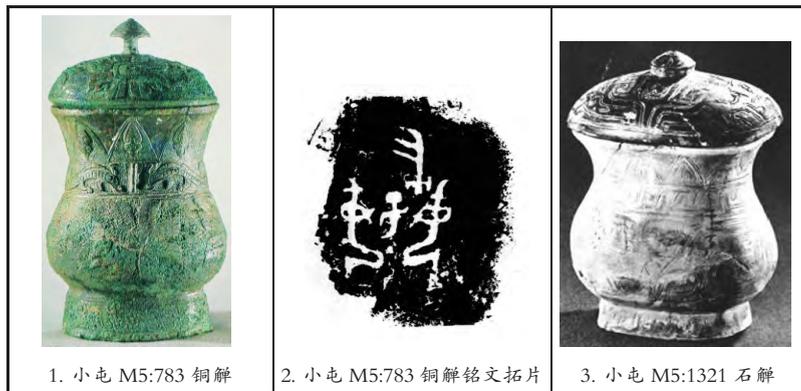
器身上加提梁亦不应为卣,应为提梁壶。既然此器甚至此类器为壶而非觶,那么最早的铜觶就当另寻。

197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一般认为是晚商商王宫殿区西南侧发现一座大墓,该墓虽然没有墓道,但是有棺椁,殉人 16 具,墓室面积达到了 22.4 平方米,是殷墟除商王陵之外最大的墓葬之一。而该墓的出土物更证明了其重要性和特殊地位。墓中随葬 1600 余件器物,海贝近 7000 枚。其中铜器有 440 多件、玉器 590 多件,还有象牙雕刻品数件。与本文讨论相关的是,该墓出土有 2 件铜觶 (M5:810、M5:783) 和 1 件石觶 (M5:1321) (图一)。由于该墓铜器铭文中“妇好”占有相当数量,所以该墓的墓主学界一般认为就是殷墟甲骨文记载的“妇好”。关于该墓的时代,在发掘之初,虽有殷墟二期武丁配偶“妇好”和殷墟三、四期卜辞中康丁配偶“妇好”之争,但由于该墓在距墓口深 1 米的墓室填土中出有 1 件殷墟二期的陶爵,所以结合出土的铜器,目前学界一般倾向认同发掘者的意见,将墓葬的时代定在殷墟二期,绝对年代为武丁晚期。由于小屯 M5 出土有“妇好”铜觶,本身即为墓主之器,所以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代的“东土”研究》(项目批准号 13CKG013)阶段成果。

这2件铜觶和1件石觶的时代当与墓葬的时代相当,为殷墟二期,那么该墓出土的铜觶无疑是已知时代最早的粗体觶,石觶为时代最早的椭方体觶。但是无论从铜觶的器形、纹饰,抑或铭文看,它的整体已非常成熟,并影响到了玉石容器类。那么在此之前,是否还有时代更早的铜觶?

2010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又获重大发现。新发现的一处商代贵族墓地,时代从商代前期后段延续至商代后期,而本次发掘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座墓葬当属M139。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墓室面积7.21平方米。尽管被盗,仍出土有14件青铜器。除1件鼎置于二层台东南角,其余均集中放置在二层台的西南角,包括1件青铜觶(图二)。关于该墓的时代,在材料公布之初就有争议,发掘者认为属二里岗期,有学者认为属殷墟一期。造成争议的原因,主要是墓葬的铜器有一定的时代跨度。简报公布的1件铜鼎(M139:1)空尖锥足,腹部亦很深,具有二里岗上层铜鼎的风格。从墓室平面图片看,封口盂的形制也具有二里岗上层铜器的一些特点。但是提梁壶(原报告称卣, M139:7)一般认为是白家庄期才出现的器类,而这件壶还与侯家庄M1022R1071壶形制接近,只是颈部更粗的特点显示时代略早于侯家庄提梁壶。罍(M139:3)的形体已瘦高,时代明显晚于白家庄期铜罍。而时代特征最明显的是该墓的另1件铜鼎(M139:2)。虽然未发表器形照片,但是从墓室平面照片看,该器足部是典型的从锥状向柱状足过渡的形态,而且腹部已较浅,是典型的中商晚期的器形特点,置于殷墟一期更加合适。因此,该墓的铜器时代横跨二里岗上层和中商时期,而最晚器形时代应是殷墟一期,所以墓葬的下限也当在此时。关于该墓的铜觶(M139:12),从墓葬共存器物推断的话,时代自然可能早至二里岗上层,也可能晚至殷墟一期,但是从器形、纹饰特点看,还是置于中商晚期比较合适。但是无疑,其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青铜觶。此外,族属方面,该墓有腰坑、殉人,而大辛庄遗址本身也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M139当是



图一 殷墟小屯 M5(妇好墓)出土的铜觶、石觶

殷人之墓,该觶也应是商文化的产物。

## 二、史前、夏商时期觶形陶器的考古发现

从最新的考古发现可知,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觶是济南大辛庄M139出土的一件细体觶,由于墓葬的时代下限为殷墟一期,因此该觶的时代不晚于殷墟一期,这也意味着青铜觶的出现时代不会晚于殷墟一期。但是铜觶是如何起源的?是和多数铜器一样,受到了陶器的影响吗?这需要我们从事前的觶形陶器中寻找线索。

从1960年开始,上海闵行区马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在发掘简报中,发掘者将一类形制与铜觶接近的陶器称为陶觶,而且数量不少。通过仔细观察,马桥遗址除了命名为觶的数十件陶器外,还有多件与铜觶接近的器形。在马桥文化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过程中,在第五层出土几件陶器,简报称之为杯,并分为三式做了介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简报中所称的式、式杯,并非陶杯。式T17:4,泥质灰胎黑衣陶,高8厘米,口径5.6厘米。口微侈、束颈、鼓腹、假圈足、弧形外撇,颈上饰一道凹弦纹。式T1:10,泥质灰胎黑衣陶,残高5.6厘米。口残、腹微垂、矮圈足弧形外撇,素面。这两式器物鼓腹,最大腹径位于器体的中下部,圈足与腹方向相异,弧形外撇的造型与杯相异而同与粗体铜觶,如大司空村M539:25觶、安阳近郊出土卫父己觶等,因此可能称之为觶形陶器更为妥当。简报中认为第 层的年代约在



图二 大辛庄 M139 出土铜觶和部分铜容器

距今 4000 年左右,为良渚文化层。而此类觶形陶器在浙江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在第 层中,简报直接命名为陶觶的 式陶器共 16 件。通过观察,这些陶器多数形制与铜觶更加接近,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器体的中下部有鼓出的折腹,且器底外撇成喇叭形。如 T102:8 泥质灰胎黑衣陶,高 15.2 厘米,口径 8.2 厘米,有鼓出的折腹,圈足外撇成喇叭形,形制与觶接近,也与细体觶有一定类似,即便此类陶器无法确定为陶觶,但至少与陶觶有一定的关系。而命名为陶尊的个别器形,如 T111:5 泥质灰胎黑衣陶,高 24、口径 9.4 厘米,腰部饰三周弦纹。形制与尊有些类似,但是体量不大,圈足较高,与著录在《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的 1 件圈足下加圈足状器座的觶形制接近。这说明此类陶器与觶形器也有一定关系。至于本层的年代,简报将年代定在了商代早期晚段。而马桥遗址 1993~1995 年的发掘同样出土较多命名为陶觶的陶器<sup>⑩</sup>,与以上同样的判断标准,其中一部分为觶,个别为杯。但是,有 1 件可以确指为陶觶。这件编号为 T1234 D:6 的陶器,泥质灰陶,高 12.6、口径 9.4 厘米。侈口、束颈,有一鼓出的折腹,假圈足,外撇成喇叭形底,素面。觶的典型特质一是体量较小,明显小于各类盛酒器,二是在器体的中下部有鼓出的腹部,三是圈足与器腹的弧线相异,器腹弧形内收为圈底,圈足外撇成喇叭形底。这件陶器完全符合觶的标准,且与铜觶形制接

近,如洛阳北窑 M1:5 邑觶、父庚觶等。而类似的器形在 1993~1997 年发掘报告直接命名为“陶觶”,且有 49 件,虽一部分为陶觶和尊,但其中亦有一定的数量的陶觶,如 T519 :1、T722 C:13 等等<sup>⑪</sup>。此外,该次发掘命名为陶尊的 1 件器物 T1121 D:6,泥质灰陶,高 13.5、口径 8.4 厘米,器腹饰云雷纹,颈部和圈足饰弦纹。体量与觶相符,而形制也符合定义为“觶”的三项标准。在与铜器比较后,器形也与殷墟西区 AGM793:9 叟父癸觶、郭家庄 M1:25 戈觶等粗体觶接近(图三)。关于本层的时代,发掘者认为与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的第 层时代相当。

在马桥遗址之外,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有一些觶形陶器。在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常出土一种被称为觶形杯的陶器,多数为圈底或平底,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器底下加有圈足,且在多个遗址都有发现。1975~1978 年发掘的山东兖州王因墓地,出土有 13 件报告称为“杯”的陶器, 式器底有矮圈足,其余为平底<sup>⑫</sup>。式的 M236:2 泥质彩陶,高 14.4、口径 8.1 厘米,上腹绘四周锯齿形红彩带,下腹三周红色彩带。该器侈口,器身中下部圆鼓,下有外撇的圈足,形制与铜觶、殷墟的陶觶十分接近,如郭家庄 M140:1 陶觶, M236:2 应该就是史前的陶觶。 式形体更加细高,如 M2521:3 泥质红陶,高 13.5、口径 8.2 厘米。形制与细体铜觶近同,如郭家庄 GM2579:011 铜觶、殷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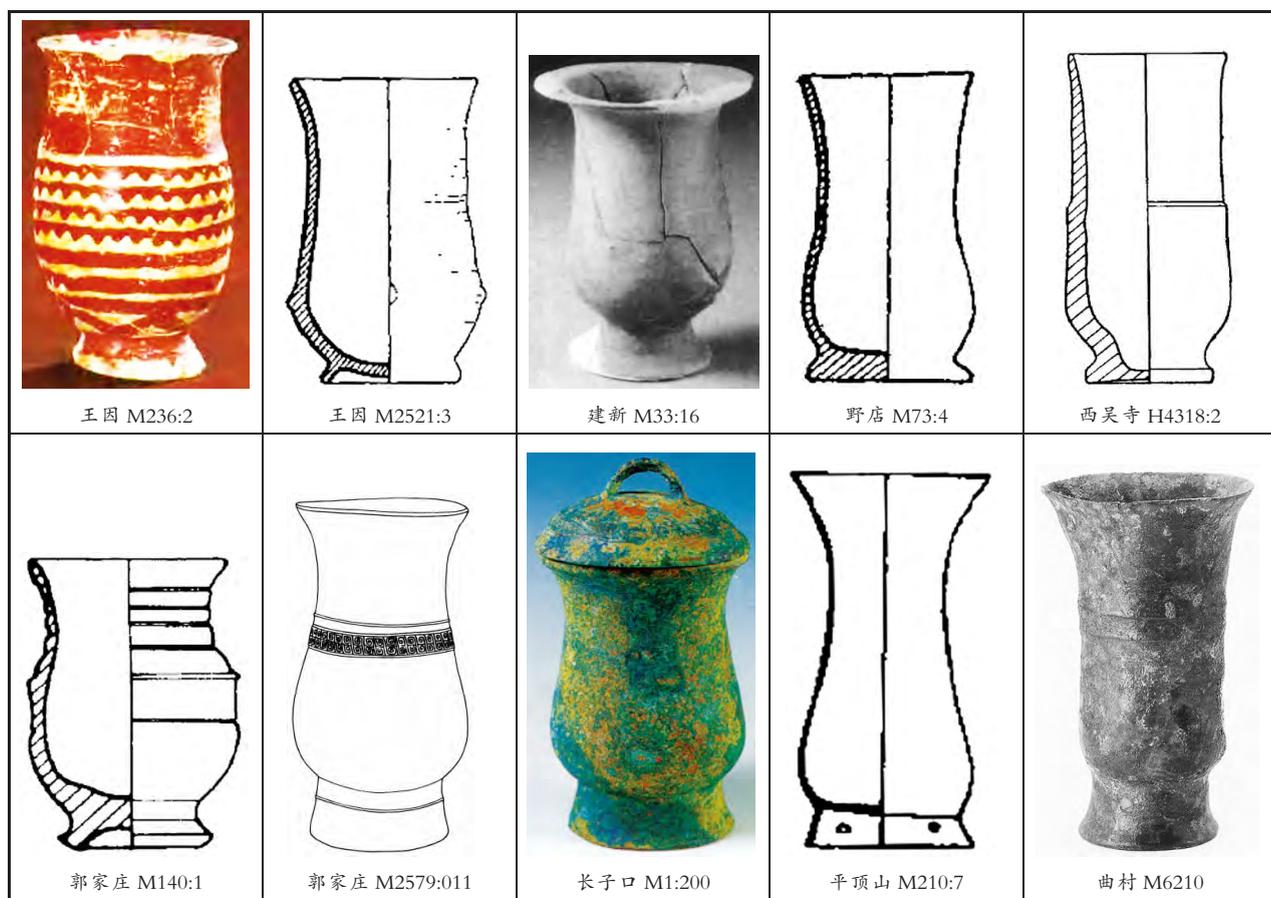
图三 马桥遗址出土觶形、觶形、尊形陶器与铜觶对比图

西区 M202:2 陶觶,而且式到式的发展演变规律也与细体铜觶、殷墟陶觶相同。其余平底杯器形似铜觶,但没有圈足,然带圈足的器物在其他一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报告或简报中也有发现。在枣庄建新大汶口文化墓地被称为“圈足杯”的 B 型中,有一部分也是陶觶,如 M33:16 黑褐陶,高 9.6、口径 7.2 厘米<sup>⑮</sup>。最大腹径在器身中下部,圈足弧形外撇,与长子口 M1:200、扶风刘家村丰姬墓弦纹觶等铜觶形制近同。还有一些遗址出土的类似陶器,因为与觶器形的接近,报告直接称为觶形杯,而其中一部分,本身就应归为陶觶。如:邹县野店 M73:4<sup>⑯</sup>,只是制作相对以上几件略显粗糙,但形制与明器铜觶基本一致,如平顶山应国墓地 M210:7 素面铜觶。到了山东龙山文化,虽然与觶形陶器功能相近的单耳杯兴盛,但是仍有一些陶觶的发现。1983~1985 年,兖州西吴寺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发现一批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存,在居址和墓葬均出土有称之为觶形杯的陶器<sup>⑰</sup>。这些陶器与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觶形制接近,而器体更显瘦高,其中的一些基本可以明确为陶觶。如 M8:3,泥质黑陶,高 12.1、口径 6.8 厘米,颈部饰有三周旋纹;H4318:2,高 13.4、口径 6.2 厘米。前者报告划分为式,后者划分为式,除整体较大汶口文化陶觶细高外,两式之间的演变规律同样是逐渐细高,与细体铜觶一致(图四)。

### 三、铜觶起源探析

从史前陶觶的考古发现,再到最早铜觶的出现,似乎可以从其中看出一定的发展脉络,并且促使我们来重新梳理和考虑青铜觶的起源问题。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山东全省、苏皖两省淮河以北和豫东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在分布于山东地区的一些遗址中,我们找到了陶觶的踪迹。王因墓地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居址和墓葬,出土陶觶的 M236、M2507、M2521 属于栾丰实先生所划分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第一期第 2 段<sup>⑱</sup>,从报告更加细致的分组表中看, M236 的时代略早于 M2507 和 M2521, M236:2 式到 M2521:3 式陶觶逐渐细高的发展演变规律也正体现了这种时代差别。而 M2507:5 细分可视为中体觶,粗略划分亦常称为细体觶<sup>⑲</sup>。但总体而言,王因遗址出土的陶觶属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绝对年代大致相当于公元前 4200~3500 年。建新遗址划归为 B 型圈足杯的 8 件陶器,全部属于陶觶。除前文所举的 1 件外,还有 M46:14 带盖陶觶,形制与刘家庄北 M1046:22 子钺乙铜觶近同。带盖陶觶的发现除了丰富陶觶的器型外,无疑更加拉近了其和铜觶的距离,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关系。而出土陶觶墓葬的时代, M48、M13 都是报告所划分的中期,其余 M33、M39、M78、M46 都是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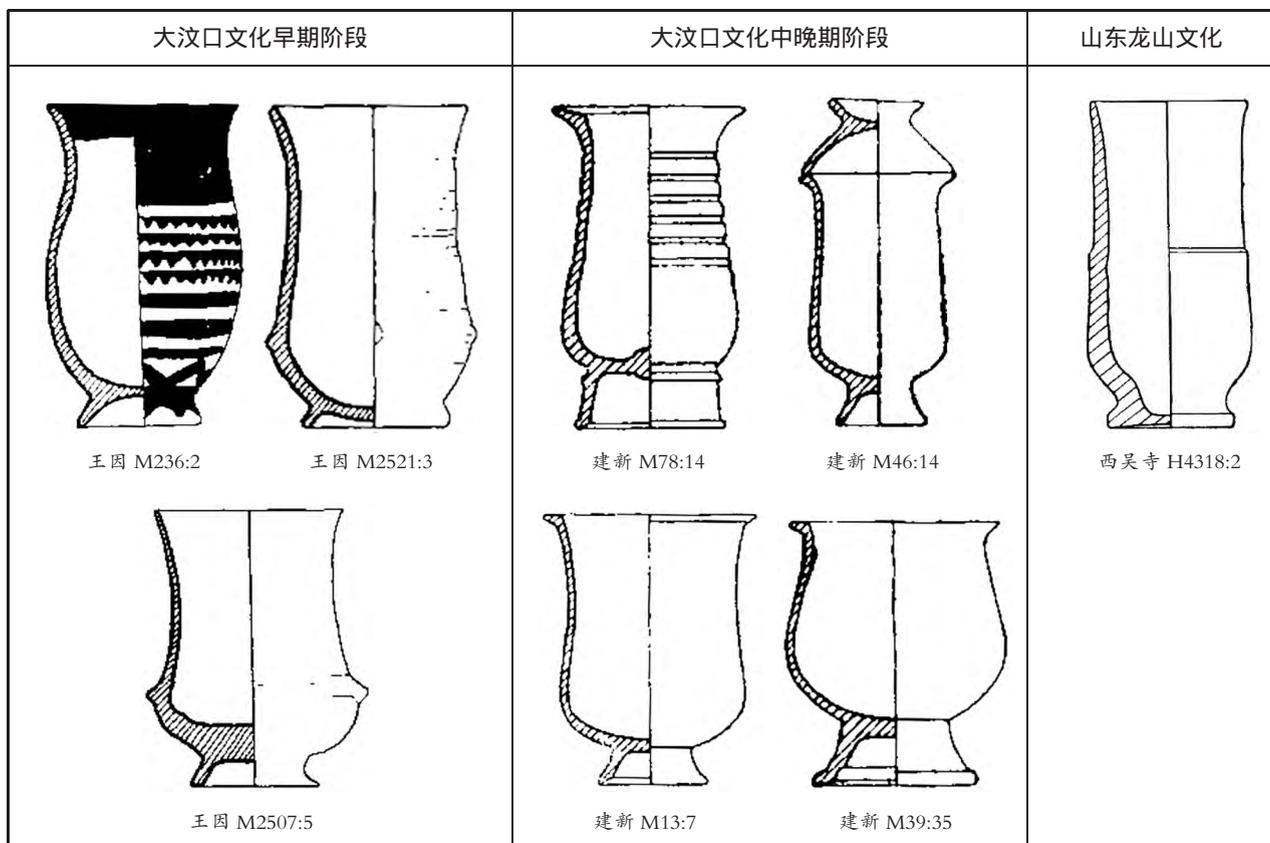


图四 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出土陶觶与仿铜陶觶、铜觶对比图

期。出土的陶觶，报告所划分的 Ba 型 M48:1、M13:7、M33:16、M39:35 都可视为中体或粗体觶 Bb、Bc 型 M78:14、M46:14 为细体。关于建新遗址的时代，报告明确确定在了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偏晚至晚期阶段，绝对年代据高精度表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2851~2398 年。野店遗址出土的陶觶，形体更加细高。M74 属于报告所划分的第五期，时代大致与建新遗址相当。野店遗址第五期栾先生也划分在了大汶口文化中后期阶段，具体为第三期第 5 段，这都说明建新遗址和野店遗址出土的陶觶时代要晚于王因遗址。同时从王因遗址到建新遗址、野店遗址也可看出陶觶的发现基本纵跨大汶口文化的三个阶段，时代上有明显的延续性。而出土也不限于单个遗址，在材料丰富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有着一定的分布范围和相对广泛的出土。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陶觶的出土数量略有减少，但仍有一定的出土。在西吴寺遗址报告称为觶形杯的陶器中，式、式 4 件陶器都应归为陶觶。这 4 件陶觶形体细高，圈足弧形外撇明显，与晚期铜觶的特点极为类似。山东龙山文化处在大汶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之间，有学者也称之为铜石并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西吴寺遗址陶觶的出土，将山东地区史前的陶觶从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再到龙山文化，完全串了起来。而且我们注意到山东地区的陶觶多数为细体觶，这与山东最早铜觶的形体相一致。甚至我们还可以排出它们的发展演变序列，出土细体觶的墓葬相对年代关系为：王因 M236→王因 M2521→建新 M78、建新 M46→西吴寺 H4318，

时代发展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山东龙山文化。具体到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上：王因 M236:2→王因 M2521:3→建新 M78:14、建新 M46:14→西吴寺 H4318:2，发展演变规律为逐渐细高(图五)。这样，“细体觶”从史前陶觶的出现、发展，再到青铜时代最早的铜觶在山东大辛庄遗址的出土，有着自身的发展序列。在出土粗体觶的墓葬相对年代关系上：王因 M2507→建新 M13→建新 M39，时代发展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具体到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上：王因 M2507:5→建新 M13:7→建新 M39:35(图五)，发展演变规律为逐渐矮粗。从以上可以看出，山东地区史前陶觶的时代序列较为明确，发展演变规律清晰，在器物演变上粗体、细体均与铜觶的情况一致，而在细体陶觶之后，细体铜觶也最早在济南大辛庄遗址出现。那么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商周时期的细体铜觶起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细体铜觶。而粗体觶最早也出现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在早期阶段和中晚期阶段均有发现。

良渚文化是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时代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在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中，我们在前文称之为觶形器，虽数量不多，但形制与粗体觶有一定的相似。其实，早在河姆渡文化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就发现有 1 件觶形陶器<sup>⑨</sup>。崧泽文化也出土有一类杯形陶器<sup>⑩</sup>，虽然数量不多，但形制与觶形陶器有一定类似。可见，觶形陶器在太湖流域有着悠久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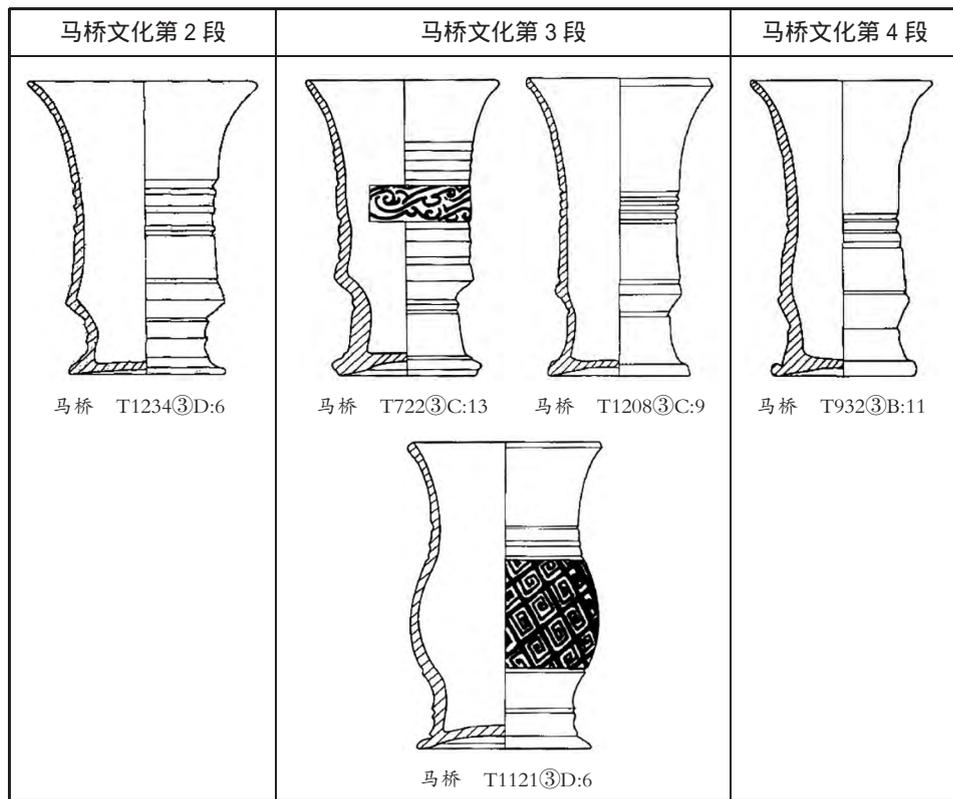
图五 山东史前细体陶觶、粗体陶觶发展演变图

而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更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且可以明确称之为陶觶的器物。出土陶觶的层位,第一、二次发掘为第 层,1993~1997 年的发掘均为第 层,依据发掘者的意见,两者的时代是相同的。关于马桥文化的时代,有学者指出以马桥层类型遗存(第一、二次发掘)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年代上限不会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前的估计可能有些偏晚<sup>②</sup>。而就在马桥遗址 1993~1997 年发掘报告出版时,发掘者也修改了之前的认识,认为马桥文化约延续 700 年,早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中期相当于商代前期,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sup>③</sup>。在出 T921 E:12、T1234 D:6 细体陶觶的 A 片 E 层、B 片 D 层

属于马桥文化早期第 2 段,出 T1121 D:6 粗体陶觶和 T922 D:14、T1208 C:9、T722 C:13 细体觶的 A 片 D 层、C 层属于马桥文化中期第 3 段,出 T932 B:11、T721 B:12 细体觶的 B 片 B 层属于马桥文化中期第 4 段。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列出出土陶觶的相对层位关系。由于粗体觶只有一种,只在 A 片 D 层。细体觶数量较多,层位关系依次为 A 片 E、B 片 D 层→A 片 D、C 层→B 片 B,据此得出的器物发展演变规律为:T921 E:12、T1234 D:6→T922 D:14、T1208 C:9、T722 C:13→T932 B:11、T721 B:12(图六)。从中可以看出,细体觶逐渐细高的演变规律也与细体铜觶相同。而在形制之外,马桥文化陶觶上的弦纹、云雷纹也是铜觶上常见的纹饰。时代上,马桥遗址出土的陶觶从早期一直延续到中期,已经进入了商代前期,基本可以和最早铜觶的出现时代相衔接。那么,铜觶的起源也显然与其有着一定的关系,可以说铜觶的出现是受到了马桥文化陶觶的影响。

#### 四、结语

综合以上可知,从大汶口文化的史前陶觶到马桥文化的夏商陶觶,形制的发展演变规律与铜觶相同,时代上也基本可与最早的铜觶相衔接。最早的史前陶觶出现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且见于多个地点的多个遗址。细体陶觶数量最多,时代可以延续到山东龙山文化。以上对于最早的细体铜觶在山东地区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细体陶觶在进入夏商时期后,在马桥文化有着继续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器身上所



图六 马桥文化细体陶觶、粗体陶觶发展演变图

饰弦纹、云雷纹对于铜觶纹饰产生了影响。粗体觶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就有发现,到了马桥文化器身所饰弦纹、云雷纹都是后来铜觶上的常见纹饰,马桥文化粗体陶觶与最早的粗体铜觶——殷墟妇好墓粗体铜觶,甚至粗体石觶都有一定的关系。在铜器的起源问题上,其无疑受到了陶器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发达的制陶技术为中国特有的范铸铜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在陶器鼎盛的阶段,一些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直接受陶器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陶器直接影响了铜器,先有了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然后铜器制作时才模仿制作出了相应的铜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商周时期的铜觶也是受到了大汶口、山东龙山和马桥文化史前、夏商时期陶觶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当然,由于陶器的易制作性和自身复杂性,类似觶形陶器在史前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也可能会有个别的发现,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马桥文化无疑是最集中和出土数量最多的,其对于铜觶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赵辉先生曾指出“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的趋势到公元前 2500 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sup>④</sup>鼎源自遥远的东方,饕餮纹源自沿海的良渚文化,包括被称为商文化标志的腰坑、狗头习俗分别在史前的豫西南、鄂西北及附近地区和淮河——汉水中上游、西北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都有集中发现<sup>⑤</sup>,我们有理由相信,至迟出现于殷墟一期晚段的青铜觶可能就是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马桥文化的陶觶,它们是在殷人尚酒文

化发展到极致的背景下,对于史前、夏商时期陶觶的模仿和再创造。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陶器与铜礼器是有着一定关系的,而对青铜觶的研究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史前是陶器的繁荣阶段,创造出了众多的器形和纹饰,在铜器起源的阶段,多数器形都是对史前陶器形制进行直接的模仿,如鼎、簋、尊、觚、爵、觶、盘等等,纹饰则是简单的移植和再创造,如铜器上常见的云雷纹、弦纹等。而在铜器兴起后,两者又有着一段并行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在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陶器,依然能对铜器形成一定影响,如爵、觚等。特别是陶觚,在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就有着重要的地位,禹州瓦店遗址还出土有成套的列觚<sup>⑤</sup>。也正是陶觚在中原的重要地位,似乎也直接影响了铜觚在最初酒器中的地位,整个商代铜觚始终处于酒器组合的核心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铜觶的发展。而在某类铜器达到顶峰之后,铜器又会反过来影响陶器的发展。如殷墟三、四期,铜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使陶觶大量出现,甚至连演变规律都与铜器一致,如殷墟西区的细体陶觶,由矮胖向细高发展。而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仿铜陶觶存在,这类陶觶形制、纹饰直接模仿铜觶,他们的制作较一般陶器精良,是一类特殊的陶礼器。铜礼器的兴盛又直接导致了仿铜陶礼器的大量出现,并成为铜器组合的一种有益补充。到了一类器物完全摆脱其他铜器的影响,成为铜器的基本组合之后,陶器基本都是对该类铜器的模仿。如商周王朝的更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酒器基本组合的变化,铜觶开始代替铜觚。而西周早期出现的陶觶,如周原 A1M19 陶觶<sup>⑥</sup>、过风楼遗址陶觶<sup>⑦</sup>等,都是直接照搬同时期铜觶的形制。而在一类铜器开始衰落后,一种是器形逐渐向极端的方面发展,如铜觚不断细高;另一种是开始明器化,如铜觶,在两周之际的晋侯墓地 M93<sup>⑧</sup>、虢国墓地<sup>⑨</sup>、平顶山应国墓地<sup>⑩</sup>、梁带村墓地<sup>⑪</sup>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而此时由于铜器本身的衰落,陶器已不再与该类铜器发生关系。也就是说,陶器与铜礼器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铜器对陶器的模仿和移植、陶器与铜器的并行发展、陶器对同时期铜器的直接模仿及两者不再发生关系四个阶段和发展层次。中国的陶器与范铸铜礼器是有着相互依存关系的两类器物,这在以铜觶为例的诸多铜礼器上都能找到例证。

注释:

李济:《记小屯出土青铜器》(上篇),《李济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 139 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年第10期。

张昌平:《论济南大辛庄遗址 M139 新出青铜器》,《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曹斌:《试析典型的二里岗期青铜器的风格》,待刊。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536),科学出版社,1962年。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 1993~1995 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②、②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 1993~1997 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⑤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⑧ 曹斌:《青铜觶的分期和年代》,《东洋古典研究》第58辑,2015年3月。

⑨ 浙江省文化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⑩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⑪ 李伯谦:《马桥文化的源流》,《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⑫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⑬ 郭志伟:《史前时期腰坑葬俗试析》,《考古》2014年第6期;《试论史前时期墓葬殉犬习俗》,《文物》2012年第8期。

⑭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4年。

⑮ 周原考古队:《1999 年度周原遗址 A1 区及 A1 区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⑯ 何晓琳:《汉水中游流域西周至春秋早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⑰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⑱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大象出版社,2012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